

罗素自传

第三卷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徐奕春 译



商务印书馆

54

2

罗 素 自 传

第 三 卷

1944—1967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徐奕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自传. 第3卷/(英)罗素著;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ISBN 7-100-04046-9

I. 罗… II. ①罗… ②徐… III. 罗素, B. (1872~1970)—自传 IV. 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0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ÓSÙ ZÌZHUÀN

罗 素 自 传

第 三 卷

1944—1967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徐奕春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046-9/K·796

200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3/4 插页 6

定价:23.00元

Bertrand Russ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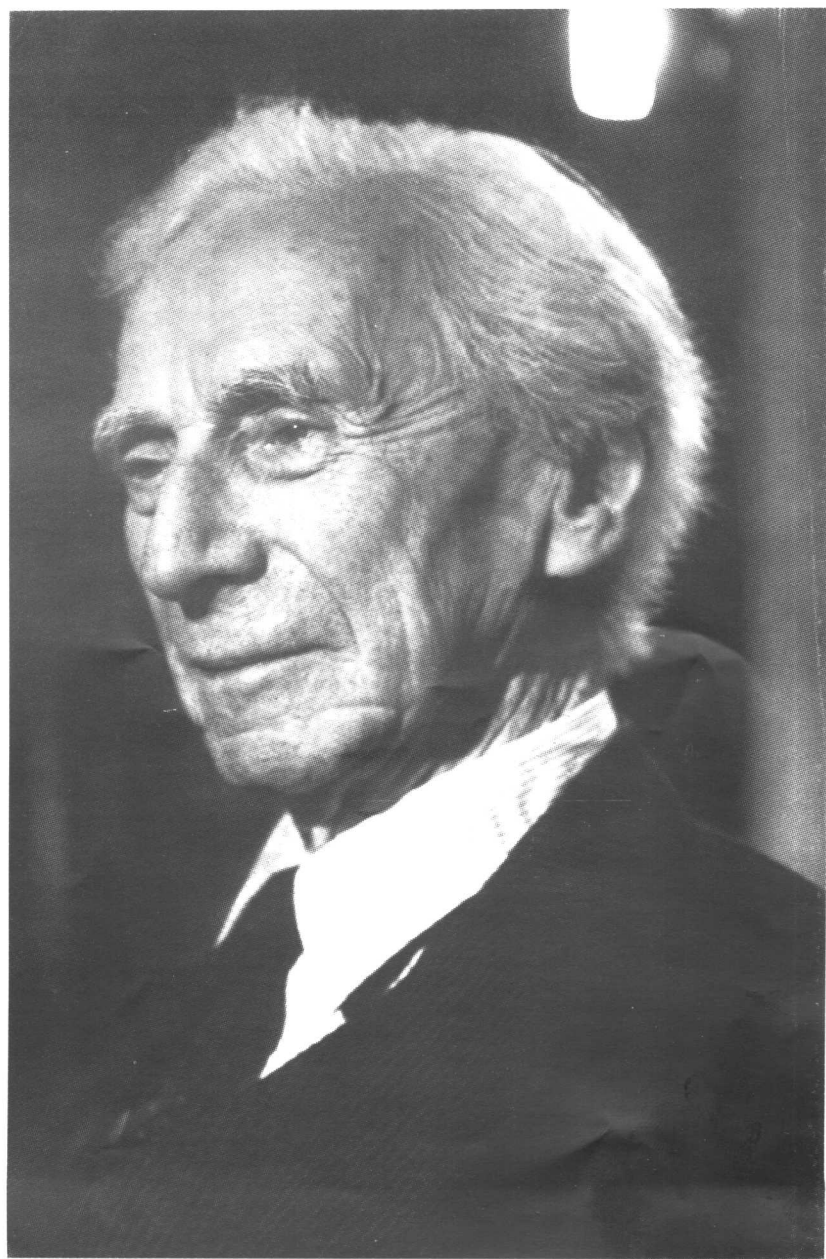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Three first published by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Reprinted 1991, 1993, 1995 by Routledge

本书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公司授权，

根据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 1969 年版译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回到英国.....	3
第二章 在国内与海外	83
第三章 特拉法尔加广场.....	141
第四章 基金会.....	222
后记.....	321
索引.....	326

插图目录

1. 在澳大利亚(1950年)..... 62
2. 伯特兰·罗素在斯德哥尔摩与约里奥-居里夫人
在一起(1950年)..... 63
3. 伊迪丝·罗素(洛特·迈特纳-格拉夫摄) 126
4. 汉斯·厄尼画的油画《伯特兰·罗素》 127
5. 伯特兰·罗素坐着,让爱泼斯坦为其塑像(1953年) 190
6. 罗纳德·塞尔画的伯特兰·罗素像(载于1957年3月
《笨拙周刊》)
伯特兰·罗素的一篇手写的反驳文字 191
7. 《标准晚报》上的漫画(1961年9月) 254
8. 伯特兰·罗素同罗特布拉特教授在一起
克里斯托弗·艾恩赛德设计的九十华诞大纪念章 255
9. 1962年2月,伯特兰·罗素冒着暴风雪在特拉法尔加
广场举行的一次禁止核武器集会上发表演说 318
10. 伯特兰·罗素在彭林代德赖斯他自己的家里(1964年) ... 319

序

本书将在造成当今世界分裂的那些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付梓。迄今,以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世界必定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它迄今为止总是不偏不倚地悬于希望与恐惧之间。

我很可能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死去——我不知道我的临终遗言应当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过去,
我们陷入黑暗之中,

还是应当像我有时允许自己希望的那样: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
黄金时代又回来了……
天公微笑,信仰与帝国隐约显现,
犹如一个渐逝之梦的残骸。

我已尽我所能,将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分量加到这架天平上去,试图使它倾向于希望一边,但对于各种强大的力量,这只是螳臂当车

而已。

愿其他人在我这一代人失败之处获得成功。

* * *

1944年,情势逐渐明朗:战争即将结束,而且将以德国失败告终。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回到英国,而且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只有约翰除外,他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在美国,都有可能征召入伍。幸亏战争结束得早,使他免去了本来需要作出的、棘手的选择。

像以前一样,我在英国的生活是公事与私事混杂在一起的,但是私事部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已发现,以同样的方式叙述早已结束和仍在继续且我生活于其中的私事和公事,那是不可能的。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因此而需要的叙述方式的改变感到惊讶。我只能希望读者认识到多样化的必然性,并且明白,为了不触犯诽谤法,对某些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保持缄默。

第一章 回到英国

15

在 1944 年上半年,横渡大西洋是件复杂的事。彼得和康拉德乘坐的是速度很快但极不舒服的“玛丽皇后”号,船上挤满了小孩和他们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抱怨所有别人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甲板上追逐打闹,随时都有掉下海里的危险,因而给大人造成极大的麻烦。但这一切我是到了英国才知道的。至于我嘛,我被送上了一艘由护卫舰和飞机护航、以自行车速度威风凛凛地前进的大船。我随身带着我的《西方哲学史》手稿,那些倒霉的审查员只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部手稿,惟恐其中有什么对敌有用的情报资料。不过,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哲学知识对德国人是不可能有用的,并且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书。说实话,对此我觉得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保密的。不许我将启航的时间或从什么港口启航告诉我的朋友。最后我发现自己乘坐的是一艘“自由”轮,这次航行是它的处女航。船长是个生性乐天的人,他老是安慰我说,“自由”轮在处女航中断裂成两段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不用说,船是美国的,船长是英国人。有一位高级船员真心实意地赞许我。他就是轮机长。他读过《相对论入门》,但对该书作者却一无所知。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他谈起了这本小书的的价值,当我说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时,他高兴得不得了。另外有位乘客,是一个商人,船上的高级船员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觉得他

这么年轻,应该去打仗。不过,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三星期。船上的长官们认为,在我们驶近爱尔兰海岸之前,不会有遭受潜艇袭击的危险,但过后他们却命令我们穿着外裤睡觉。不过,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旅程结束的前几天,盟军便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西欧,我们是从无线电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几乎全船的人都可以来听无线电广播。我从无线电中听到“*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①的英译。这句话的英译是:“好啦,朋友们,就这么干吧!”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把我们卸在福斯湾北岸的一个小港埠。我们艰难地走到了一个最近的城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战争时期的不列颠。就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来说,镇上全是波兰士兵和苏格兰姑娘,波兰士兵很英武,苏格兰姑娘则非常妩媚动人。我乘夜车去伦敦,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我一度无从知道彼得和康拉德的情况。最后,在疯狂地打了许多电话和电报后,我终于得知他们同彼得的母亲一起住在锡德茅斯,康拉德得了肺炎。于是,我立即赶去那儿。令我宽慰的是,他正在迅速康复。我们坐在海滩上,谛听瑟堡那边传来海军的隆隆炮声。

在此之前,三一学院曾邀我去作为期五年的讲学,我已接受了邀请。这项邀请还附带以下优厚条件:兼任大学评议员,并有在学院里获得几间住房的权利。于是,我就去剑桥。到了那里,我发现住房非常令人愉悦,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草地滚木球场,在那绿茵茵的草坪上开满了鲜花。看到剑桥之美毫无衰减,令人欣慰。我还发觉,“大庭院”的祥和恬静使人的心境产生一种几乎难以置信

① 法语,意为:前进,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译注

的宁贴。但彼得和康拉德住的问题仍未解决。当时剑桥人满为患。起初,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住所是寄宿舍里的几间脏兮兮的房间。他们住在那里可怜兮兮的,吃不饱饭,而我在学院里却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我一知道我将因起诉巴恩斯^① 而得到一笔钱时,便立即在剑桥买了一所房子。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一些时候。

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一天,以及随后举行大选的那段时间,我们就是住在那所房子里。我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一书,大部分也是在那里写的。我本来可以在剑桥过得很愉快,但剑桥的那些女士们认为我们是不应该受到尊重的。我在北威尔士的费斯廷约格买了一所风景非常优美的小房子。后来我们在伦敦租了一套公寓房。虽然我花了许多时间到欧洲大陆去讲学,但这些年我并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当1949年我的妻子决定她不再需要我时,我们的婚姻就结束了。

整个40年代和50年代初,在核问题上,我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困惑焦虑状态。在我看来,一场核战争显然会毁灭人类文明。同样明显的是,除非东、西双方的政策都有所改变,否则核战争肯定迟早总要发生。从20年代初起,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危险。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几个博学的物理学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但大多数人,不仅是大多数普通人,而且甚至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不会发生原子战争,因而总是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调说:“哎呀,人们绝不会那么愚蠢。”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使科学家们,以及甚至少数一些政治家,首次注意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两个日本城市遭到轰炸后没几个月,我在上议

^① 参见《罗素自传》第二卷。

院作了一次演讲,指出可能会发生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必定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我预测并解说了威力远比用于广岛和长崎的那些炸弹大得多的那种核弹的构造,它不同于老式的裂变弹,而是一种聚变弹,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氢弹。那时还有可能对这些怪物实施某种管制,规定它们只能用于和平而非战争的目的,因为当时我所担心的军备竞赛尚未开始。如果想不出管制的办法,局势几乎就会失控。这用不着多大的想像力就可以预见得到的。每个人都为我的演讲鼓掌,没有一个议员认为我的担心是过分的。但是我所有的听众都一致认为,这是个由他们的孙子那一辈人去考虑的问题。尽管已有数十万日本人死于非命,但没有一个人懂得,英国只是由于幸运才得以幸免,而在下一场战争中,她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一个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只有大国之间达成协议才能避免的国际性危险。人们有过一些议论,但没有任何行动。这种安然自若的态度,在外行人当中,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谁要是试图谈论原子弹而使人感到不安,谁就会被看作是惹是生非者,被看作是应当避而远之的人,被看作是杞人忧天、败人兴致的人。

与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相反,我像其他少数几个人一样,一有机会就指出这种危险。当时我认为,而且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为避开正在迫近的危险而进行筹划和采取行动的时机,是在最初看到这种危险正在迫近之时。一旦危险的挺进已成定局,要想阻止它就难上加难了。所以,当美国向俄国提出巴鲁克计划时,我感到有希望了。当时我对该计划以及美国提出该计划的动机的评价要比我后来知道应当怎样评价它们时高一些,但我现在还是在想,要是当时俄国人接受了这个计划就好了。然而,俄国人没有接

受。他们在 1949 年 8 月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他们显然会尽其所能使自己在摧毁能力——或者,说得客气一点,防卫能力——方面与美国相匹敌。除非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则军备竞赛已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才在 1948 年末提出建议说,补救的办法也许是由美国向俄国发出立即发动战争的威胁,以便迫使其核裁军。我已在我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附录中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为自己在 1948 年所持的观点作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我当时认为俄国很可能屈从西方的要求。但是,在俄国拥有相当多的核机队之后,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18

我的这一建议迄今仍被人用来指责我。共产党人反对它,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通常的批评是说我,一个和平主义者,竟然一度鼓吹用战争来威胁。我令人厌烦地一再重申以下观点似乎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相信有些战争,当然是极少数的战争,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些战争之所以必要,通常是因为人们允许一些事情在罪恶昭彰的道路上拖延下去,直到没有任何和平的手段能加以阻止。批评我的人好像也没有考虑到持续的冷战所带来的这些恶果,而假如我那用战争加以威胁的建议在 1948 年被采纳的话,那么这些恶果,连同冷战本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纳,尽管结果如何仍只是臆测,但就我能看到的,提出这一建议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也不表明我的思想“反复无常”。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非真地指望它会被采纳。所以,过了不久,我也就把它忘了。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后又有一次我不知道竟会成为报刊剖析的题材的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后来,当那封信的收信人要求

我同意发表这封信时,我就按照自己通常的做法,没有考虑信的内容就说,如果他想发表就发表吧。于是,他就把这封信发表了。当我发现自己原先所提的建议时,自己也大吃一惊。我也完全忘了自己曾在上述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糟糕的是,在此期间,在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我面前之前,我一直极力否认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真是遗憾。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那是可耻的。一个人只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或予以收回。就这件事来说,我能够,而且的确能够,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我本应该早一些这样做,但由于我记忆的错误而没有及早这样做,我根据多年的经验太盲目地信赖自己的记忆力了。

在此期间,我个人的思想越来越乱。我变得日益悲观,很乐意尝试人们提出的任何一种可以避免核战争的方法。我的心情,就像人们在雷暴积聚于地平线上而还没有遮住太阳时易于感觉到的那样,过分的紧张和恐惧。我觉得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或拒绝人们提出的任何措施。我想,要不是我私生活幸福,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有几年,我每年都应邀到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帝国防卫学院去演讲。但在一次演讲后,人家就不再来邀请了,我在那次演讲中发表评论说,我知道他们相信,没有宗教的帮助,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我读过“登山训众”^①,但是,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未能在其中找到提及氢弹的只言片语。我的听众显得很尴尬,因为他们是好基督徒,当然也是好战士。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

^① “登山训众”:据《圣经》记载,耶稣有一次登山,在山上告诫众门徒,什么样人“有福”及为什么“有福”。见《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5章1—12节。——译注

把基督教同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结合在一起，很难说是有理的。

1948年，西方列强力图建立一个应是世界政府之胚芽的联盟。保守党表示赞成，并希望英国成为其中一员。工党经过一番犹豫，表示反对这个方案，但允许其党员个人自由决定支持与否，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恰当的即可。我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讨论这个方案的国际代表大会，并对出席这次大会的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中的某个人进行了可能多少有点过分的攻击。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坚持认为共产党员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观念。此事正好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垮台之后，因此，我的发言博得与会大多数代表的完全赞同。由于受到共产党人的粗暴对待，小马萨里克^①愤然自杀，这一事件使我们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全都感到很震惊，并且，我们大家几乎全都深信，与东方合作目前是不可能的。我说：“如果你能说服我，使我相信你们将自己最杰出的公民迫害至死就是一种比西方更高的道德观的体现，那么我就准备支持你，但是，在此之前，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在我回到英国后，战争行将结束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政府派我去给部队讲课。由于战争已接近尾声，部队变得比我预料的更具和平倾向。我记得，有一次，拉斯基^②和我一起被派去给一些航空兵讲课。拉斯基比我激进，他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我在

① 小马萨里克(Jan Masaryk, 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和外交家。1925—1938年任驻英国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1948年2月留任外交部长，但几个星期后跳楼自杀。——译注

② 拉斯基(H. J. Laaki 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新学院，曾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自1926年起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政治学。1945年任工党主席。——译注

讲课讲到一半时,忽然发现有一半听众正蹑手蹑脚地溜出讲课大厅,我感到很纳闷,是不是我以某种比光是不够激进更激烈的方式冒犯了他们。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人是被叫去阻击德国人对英国的最后一次空袭。

在柏林空运时期,政府派我到柏林去帮助劝说那里的人民,使
20 他们相信,阻止俄国人想把盟军撵出柏林的企图得逞是件值得一干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能够炫耀自己是个军人。我临时被当作武装部队的一员,并且还领到一张军人通行证,这使我相当高兴。

我对昔日的柏林非常熟悉,而此时我所看到的断壁颓垣、创痍凄景,使我感到震惊。从我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几乎看不到一幢仍然直立着的房子。我弄不懂当时德国人住在什么地方。这种彻底的破坏,部分是英国人造成的,部分是俄国人造成的,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极端错误的。想到我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道理地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我就感到恶心。我觉得,既然德国人显然马上就要投降,那也就够了;不但杀死 13 万 5 千名德国人,而且还毁掉他们所有的房屋和无数的财宝,这是野蛮的行径。

我觉得,同盟国对德国的处置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愚蠢。战胜国政府将德国的一部分交给俄国,一部分交给西方,这样势必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延续下去,尤其是由于将柏林加以分割,致使西方除通过航空途径外,无法进入自己在柏林的占领区。战胜国政府曾设想过俄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一种和平的合作,但它们应该预见到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感情而言,已发生的一切乃是同作为西方共同敌人的俄国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继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已经搭好,这是那几个政府愚蠢透顶的行